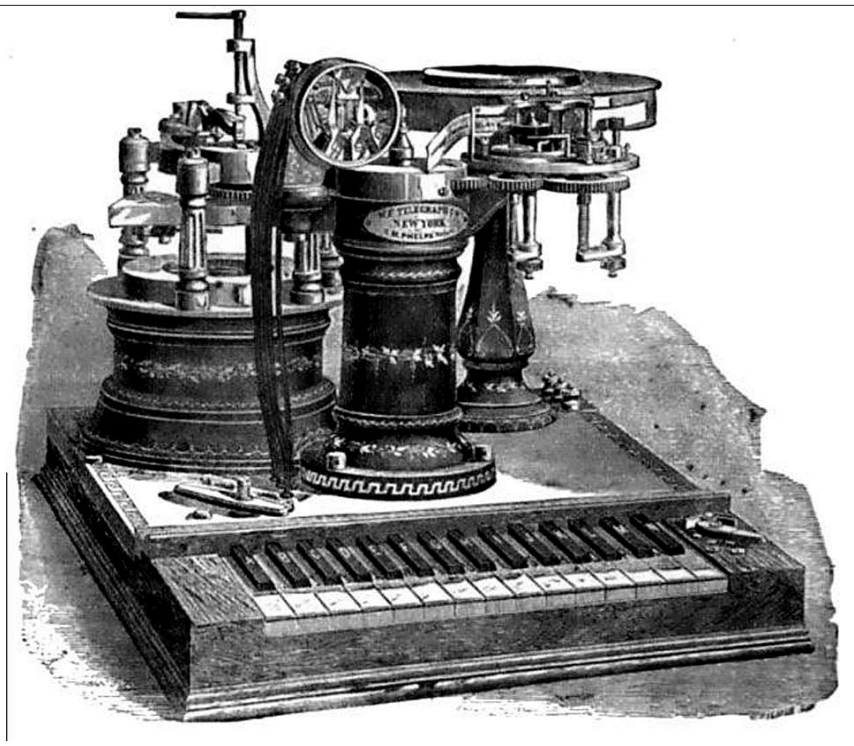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触电的帝国》被电报改变的帝国

□书评人 陆新之

电报对于大清帝国的破坏性创新作用，就像是互联网对于突尼斯等中东诸国。看完这本马伯庸合著的《触电的帝国：电报与中国近代史》，最大的感触是以上这句。

电报进入中国的时间略晚，它始于晚清，盛于民国。从清末开始，电报的身影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代，扮演着重要角色，深刻地影响到了那一段时期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乃至文化。古老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的抗拒、抵制到将信将疑地接受，再到走“有大清帝国特色的电报之路”，再到“中华民国特殊的电报创造性使用”，中间确实波折不断，花样百出，有守旧，有创新，也有东西方文化在电报中的融合。许多重大的清末与民国历史事件，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；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，更是因为电报这一新鲜工具才得以成为一时明星。原来不仅是互联网时代，早在电报时代，每个普通人就有十五分钟吸引世人关注的“超级明星时间”。

《触电的帝国》
作者：马伯庸
阎乃川
浙江大学出版社
2012年4月版
定价：26.80元

无论是慈禧太后试图直接沟通英日美首脑的电报外交，还是各地商人联名电报上书巧退大阿哥力保光绪帝位，由盛宣怀借助电报战智取胡雪岩，由总督巡抚的“东南互保”到封疆大吏的“通电誓师”，数十年间，事关中国国运盛衰的大事，几乎都与电报息息相关。尤其是民国的舆论战，当事者无不通过电报大打出手，雄辩滔滔，可谓成也电报、败也电报。

两位作者眼光独到，出手如电，在浩瀚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之中，精确地捕捉到了其中的闪光之处，然后谋篇布局、援引史料娓娓道来，于八卦闲谈中，讲出一段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，让人忍俊不禁之余又掩卷深思。

电报传递速度快，但是成本高，所以使用的时候，讲究的是惜墨如金，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。只是民国期间大有例外，有一种中华闻人的电报，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，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，洋洋千言乃至万言。民国对通电的挚爱无与伦比，上台要通电，下野要通电，嘉奖要通电，谴责要通电，讨伐要通电，和谈要通电，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也要通电……

有人做过统计，1912年有案可查的比较拉风的民国通电有三十三次，1913年有四十次，1917年有七十二次，1920年六十七次，1922年九十七次，1926年五十次，1927年五十一次。如果今天“舌尖上的中国”大热，那么八九十年前，“通电里的中国”也是沸沸扬扬。

当年的通电，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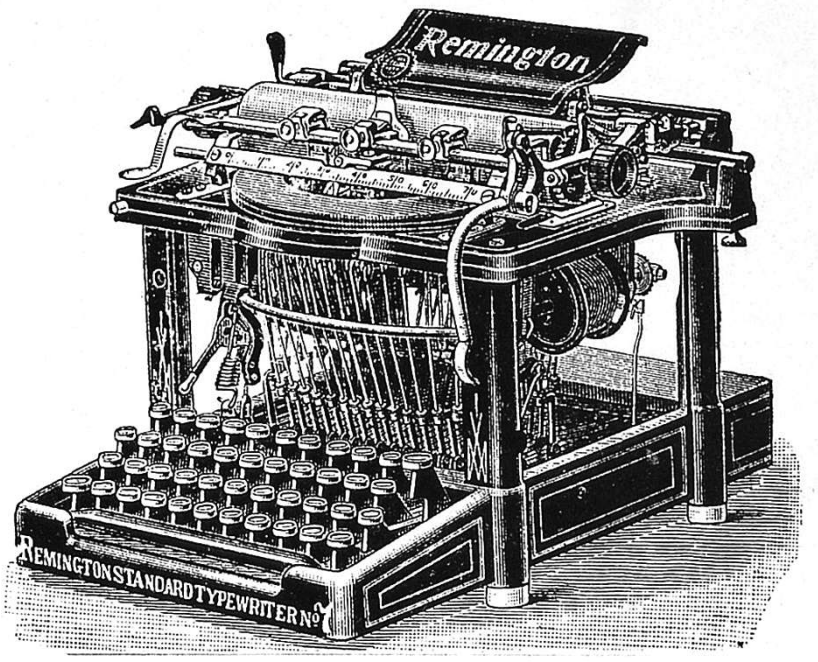
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，范围广，实际上属于“公开信”的一种，它是某个政党、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信手段。民国时代没有电视，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，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，速度又慢，唯有通电才能够把自己的主张快速传遍全国，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，是以大受政客欢迎，简直就是“公众人物”天生的好工具，比起奥巴马的社交网络更强。

直奉战争之前，张作霖发过一篇通电骂吴佩孚，题头写着“大总统（徐世昌）钧鉴：国务院各部总长、各衙门步军统领、警察总监、曹巡阅使、督军、省长、司令、师旅长、护军使、镇守使、各省议会、商务总会、农会、工会、教育会、商会、各报馆公鉴”，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。相当于将当时微博的大V一网打尽，希望能够获得百万转发的效果。

但是，他的对手吴佩孚当时在海内外一致获得极高声誉。因为秀才出身的吴玉帅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：此人擅长操纵舆论，对“通电”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，比其他军阀理解得都深得多。他的“长微博”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吴佩孚数次得意，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，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，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。化舆论为战场，通电为枪炮，与皖系、安福国会、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，收放自如，手法纯熟如烹小鲜，竟收全功。吴也一度虎踞洛阳，五十大寿之时，获得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——康有为贺寿联语的超五星级好评。

只是俱往矣。

掩卷之际，想起新技术对于老大帝国的推动作用，不由人不念及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

老式的电报发报机。

《乾隆十三年》陷阱与省悟

□书评人 王英

本书的主旨十分清楚，即展示各种“时代意见”，同时充分考虑古人本身的“历史意见”， 以这两条线索为中心来研究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。

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考虑古人“历史意见”，在乾隆朝自身历史的轨迹和脉络中重建历史，作者熟读《高宗实录》，倒的确是呈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乾隆十三年。根据这一部分的逻辑，乾隆的很多做法都是效法唐虞三代，实现儒家至高境界的重大实践。他君代相职，乾纲独断，希望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，而且得到了一些名臣的支持，如杨名时、方苞、蔡世远，都功不可没。在这样积极努力下，清代形成了“经世学派”，经世之学蔚然而起，涉及农政、粮政、荒政、赋税、矿政、河工、漕政等等。

乾隆回复三代包含许多重要内容，如议改土地制度，均田限田，对租佃问题进行协调，劝减田租。特别是粮政上的新举措，是回复三代努力的重中之重，为清代粮政提供了安全保障，并掌管施惠、恤养、赈济等，特别是在赈济中作用不可磨灭。但是，乾隆想为清朝创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的理想是破灭了，根据高王凌先生的研究，他失败于官累、吏偷、民玩。官员旷废职守、徇私贪腐，吏治中问题更多，因循、观望、粉饰、欺瞒、疲玩、废弛，而民众也趁赈灾闹事，聚众罢市，伪冒丛生。经历过这些，乾隆不得不放弃他宏大的努力，回到雍正苛严的老路上，锐气和理想都已经退去，对新政的追求已经止步，十三年又回到原点。

《乾隆十三年》
作者：高王凌
经济科学出版社
2012年6月版
定价：32.00元

在谈论乾隆的理想和他的失败的章节，《乾隆十三年》恢复了它固有的讲故事的优雅和练达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精彩的问题：乾隆这一次回向“三代”，有没有“谋主”？与前代，（汉、宋）有所不同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，但皇帝背后是否还有策动者和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？在官僚集团内部，是否形成了一个支持者团伙，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，曾否出现过两个政治派别，甚至造成管僚队伍的分裂？隐含在文本内的还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，如清朝满族统治的特性如何影响了乾隆和官僚阶层，回向三代的失败和乾隆后期的政策之间有何关联？这些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回答，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，这本来是一出饱含人性气息，交织着权力斗争和理想追求的生动故事，原本可以在清代历史脉络中细细梳理，在《大清实录》中寻找生动的细节，却都被时不时冒出来的“现代关怀”所打断。

这本书似乎是两条线索夹缠在一起，一方面想深入到古人的想法中去理解古人，“知人论世”、“同情之眼光”；另一方面，证明“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先声”，是现代化努力的开始，用大量《高宗实录》中的材料证明斯科特“国家清晰化”理论。作者试图做一个有时代气息的研究，“古今两相观照”，“对当代改革做一个历史说明”。 在这个意义上，这是一种难得的创新努力，也可以在自己的框架内自圆其说，是一个成功的尝试。但理论先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史料解读的偏差，影响了论述的说服力。

《乾隆十三年》似乎是批判“中国封建落伍”这一论断， 而努力证明乾隆朝“并非专制”，一切政府努力都“合乎现代的标准”。于是在反复证明了乾隆朝前十三年多么合乎“现代标准”，政府行为和欧洲多么相似和“共时”之后，他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“近代史观”的局限性，全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自我否定和反省。

责编 曲飞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张彦君